

September 2018

"The Unspoken Beauty": A Review of *Beauty and Sublimity: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Lei Y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Yu, Lei. 2018. "'The Unspoken Beauty': A Review of *Beauty and Sublimity: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8, (4): pp.171-17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8/iss4/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未可言说之美”：评《美与崇高：文艺认知美学》

——兼与帕特里克·霍根教授商榷

于 雷

摘 要：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文学认知研究专家霍根教授再推力作《美与崇高：文艺认知美学》^①；该书尤其旨在为文学中诸多纷繁的个体审美反应探求一种结构性主张，同时借助与认知科学的对话，使得文学美学研究中那向来“未可言说”的部分获得空前的认知审美观照。本文拟聚焦于“信息加工”与“情感机制”、“审美共性”与“个性品味”以及“变奏”“经典化”与“审美争议”等三大关键节点，在对它们加以厘清的同时，凸出围绕文学认知研究路径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加以商榷。

关键词：帕特里克·霍根；《美与崇高》；美学；文学认知

作者简介：于雷，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批评理论研究。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89。电子邮箱：yulei@bfsu.edu.cn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爱伦·坡小说寓意发生的逻辑界面研究”[项目编号：13BWW03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Unspoken Beauty”: A Review of *Beauty and Sublimity: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bstract: Patrick Colm Hogan’s newly published monograph *Beauty and Sublimity: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ims to explore, among others, the architectural substratum underlying miscellaneous aesthetic responses i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nd, by having recourse to a dialogue with cognitive science, enables the previously “unspoken beauty” to secure an unprecedented cognitive attention. This review, on the one hand, focuses and elaborates upon such three crucial topoi a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emotion system,” “aesthetic universals & the diversity of taste,” and “variation, canonization & aesthetic argument,” as illustrated in Hogan’s work, and, on the other, takes issue with a few research trajectories arising in the present literary cognition studies.

Keywords: Patrick Colm Hogan; *Beauty and Sublimity*; aesthetics; literary cognition

Author: Yu Lei, Ph. D., is a professor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ories of criticism. Address: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o. 19 North Xisanhuan Road, Beijing 100089, China. Email: yulei@bfsu.edu.cn Funding: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 (13BWW037).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英伽登（Roman Ingarden）便提出了“文学艺术品的认知”问题（Ingarden 4）。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与艺术认知研究得以引起广泛关注，则是近十来年的事。认知语言学家马克·特纳（Mark Turner）对“文学

认知主义”的到来同样满怀信心，但不容置疑的是，文学研究与认知科学这两大阵营的从业人员不仅对彼此的研究方法、内容和理论相对陌生，而且有可能陷入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人文学者利用科学术语加以猎奇的功利心态，另一方面则是

认知科学家对于文学数据的化约式收编(Hogan, *Cognitive* 2-3)。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资深教授帕特里克·霍根(Patrick Colm Hogan),作为文学认知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国际学者之一,自2003年到2016年间连续出版了其“文艺认知研究五部曲”;其中,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新近推出的《美与崇高:文艺认知美学》(*Beauty and Sublimity: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在前期著述业已建构的认知理论框架下进行了一件颇具挑战的工作——为“未可言说”的个体审美反应探求“可为言说”的结构性主张。本文拟聚焦于此书的几个核心组件加以梳理、辨识和讨论,同时结合笔者邀请霍根教授来华期间所作交流,试图把握霍根文艺认知美学路径的关键节点,并围绕文学认知研究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商榷。

一、“信息加工”与“情感机制”

探讨审美反应的内在机制,首要工作是对“个体美”(personal beauty)与“公共美”(public beauty)加以甄别:前者指的是“被某人反应为美的对象”,后者指的是“公众称之为美的对象”(Hogan, *Beauty* 25,49)。“个体美”对应着我们的“审美反应”,也即“某人体验某对象为美的程度”,而“公共美”则关乎“某对象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那些业已为社会所公认的威信标准(prestige standards)”(*Beauty* 25,49)。“个体美”涉及的是“美”的“心理学意义”,因而也是审美独异性(idiosyncrasy)赖以产生的重要源泉;“公共美”则建立在主流社会规范意义之上,因而在文学政治语境下往往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批判的主导意识形态存在着共谋之嫌(51)。毋庸置疑,基于“个体美”所产生的审美反应表现出高度独异性,并借此与认知科学的结构性观照产生强烈对峙。这为霍根的文艺认知美学研究找到了最直接的问题意识。

神经科学已经证明人类的审美反应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信息加工功能”,具体说来包括两类原则:一是“非反常性意外”(non-anomalous surprise)。我们的审美愉悦之所以产生,乃是在于审美对象既是“新奇的”,同时也是“可以理解的”;霍根将其理解为“部分的不可预测性”。“意

外”在于其逃逸受众的预期,“非反常”源自其依然能够为受众所辨识的规则或模版;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尚不为人所惯常的模板提取(pattern isolation)”。二是“原型接近”(prototype approximation)(*Beauty* 44)。此处的“原型”并非“公共美”所依据的社会威信标准,而是“个人记忆及其情感变量的影响力”(22),属于统计学意义上的“加权平均值”(45);这一信念也是霍根在其他著述中围绕“阐释性”认知研究(相对于“实证性”研究而言)所强调的“以海量实现均衡”的大数据理念(*What Literature* 5)。

出于修正、完善之目的,霍根在书的后半段又增添了所谓“基于范例的第三种审美信息加工形式”——“范例接近”(exemplar approximation)。“范例”指的是审美主体记忆中那些“独特且高度凸显的事例”,它们能够指导审美主体以某种经验性姿态去接触新的审美对象,并在此过程中通过发现新对象与范例之间的表征相似性而获得愉悦。“范例接近”与“原型接近”虽看似趋同,但实际上依然具有明显的程度差异:“范例”能够为审美主体所确切了解,而“原型”则相对要模糊得多(Hogan, *Beauty* 137)。霍根以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为例,将男主人公纽兰(Newland)亲吻太阳伞那一幕视为“范例”,认为正是这一幕“激活了”读者对于小说中“整个亲吻序列”的回忆(144)。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世界中,纽兰之所以认为布希高勒(Dion Boucicault)的戏剧《流浪汉》(*The Shaughraun*)颇具感染力,据霍根看来,很大程度上乃是取决于纽兰本人(作为观众)围绕舞台上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离愁别绪,找到了一个储存在其本人记忆中的“范例”——他与奥兰斯卡(Olenska)伯爵夫人之间的道别。可见,霍根的文学认知理论不仅可以作用于现实世界中的读者审美反应,同样也适用于虚构世界中人物的审美反应。这一“穿越”有助于满足认知科学理论对文艺美学深层机制的建构,但也围绕文艺认知美学本身的局部合法性提出了新的潜在课题(笔者将在下文做进一步探讨)。

审美反应的构成要素除了信息加工之外,还涉及情感机制。“审美”与“情感”产生对话的认知神经基础,在于人脑中的“尾状核”(caudate nucleus)使我们产生依附情感,而依附情感在理

解审美反应方面具有独到的价值(Hogan, *Beauty* 30-31)。与“美”相联系的是由积极因素(如团圆)所带来的“安全依附”(attachment security),与“崇高”相联系的则是由消极因素(如孤独)所引发的“不安全依附”(attachment insecurity)(107-108)。值得注意的是,消极依附情感并不等于“反审美”体验;相反,它倒可能以某种独特方式使我们的审美反应得以增强(115)。

围绕“美”与“崇高”之间的情感区分,霍根以《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为例指出:“美”常见于喜剧,而“崇高”则多关乎悲剧(*Beauty* 35);“美”某种意义上关乎如何通过依附情感去克服寂寞(solitude),而“崇高”则关乎“存在性孤独”(existential loneliness)。正是在此意义上,当赛普蒂默斯(Septimus)陷入孤寂之境时,他恰恰发现了“崇高”,因为当事人“既体会到了绝对隔离所带来的恐惧,与此同时也对那一隔离加以识别,甚至于接受”(40)。接受孤独,即是霍根所说的“禁欲式”(stoical)崇高形态,它与“出窍式”(ecstatic)崇高的区别在于,前者以丧失依附对象为特征(如亲人的故去),而后者则以失去自我为特征(如宗教神秘主义中的自我消融)(119-20)。总之,依附情感的不同层面——“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安全与不安全、慰藉与对团圆的奢望”(40),分别对应并作用于审美反应中的“美”与“崇高”。

二、“审美共性”与“个性品味”

霍根在书中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是“审美共性”与“个性品味”之间的对立统一。尽管“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个体审美过程中的独异性与共性原则却并不必然存在矛盾,原因在于两者的运作实际上乃是“发生在不同的层面之上”;霍根举例说,我们不能因为作为自由落体的羽毛在常规条件下比保龄球坠落时间长,而否认万有引力定律的存在(Hogan, *Beauty* 51)。其次,审美独异性与共性审美原则之间的兼容还得益于人脑中被激活的“内源性奖赏机制”(endogenous reward system)。“非惯常性模版识别”(non-habitual pattern recognition)作为一种共性原则,意味着我们在审美体验的进程之中必须以“[模版]尚未被

充分预测”的即兴姿态加以展开。它所包含的编码复杂性决定了内源性奖赏机制的激活强度,并因此注定了审美反应的个体差异(53-55)。再者,即便是“原型接近”这一高度“共性”的审美原则也同样包容了审美“品味的多变性”,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原型的总体趋向性能够保证审美反应的多变性受到规约,不至于过度“随意”;第二,原型的生成往往来自于发育“关键期”的幼年经历,它们看似“独异”,实则数量“更为有限”;第三,依据情境认知理论的发现,我们的认知原型在借助每一次全新经验的“改造”之际,能够实现其自身的“即兴建构”;此外,原型在被激活的过程中可能遭遇各种变量,如专业化差异(批评家相较于普通读者)、类型化差异(“丑小鸭”相较于“白天鹅”)以及情感化差异(“爱屋及乌”)(58-61)。总体上看,霍根围绕原型运作与动态审美这一对程式,大致建构了这样一种函数关系,即共性认知进程(作为信息加工方式)能够且必然产生个性认知结果(作为信息输出方式)。

围绕审美反应的“个体品味”特质,霍根还突出探讨了所谓的“未可言说之美”;在他看来,这一美学现象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策略性模糊”不乏异曲同工之妙——如霍根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对于文学和艺术对象的把握实际上针对的并非作品本身,而是“我们自己围绕一部作品所产生的想象”,一种在现象学家那里被称为“意向性客体”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务必借助“文本指令”的引导,对作品中的“意向”加以“拟真”(simulation)(Hogan, *Beauty* 76)。所谓“拟真”,即是“利用我们对既往情境的独特记忆……去想象一种并不存在抑或未曾经历的情境”;“拟真”带来的直接美学效应是,艺术家们能够借助认知与情感因素的协同合作,创造出所谓的“空白美学”(aesthetics of absence),进而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作品意向的不确定性。但是,霍根恰恰认为,“在围绕审美对象展开的拟真进程中拥有一些回旋余地,反倒可能增加审美反应的相似度”——这一看似颇具悖论的判断实则揭示了不容忽视的内在肌理:“范畴化”(categorization)的规约作用不仅作用于个体记忆,也同样作用于个体记忆影响下的拟真与原型接近机制(79-80)。

霍根在例释“空白美学”时,先后借助泰戈尔

与海明威的作品,说明认知图式如何能够对潜在的审美偏离加以修正,但却忽略了一个更为典型的传奇案例——劳伦斯·斯泰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在那部堪称“前意识流风格”的作品中,叙述者因为难以用语言去描绘一位寡妇的闭月羞花之貌,竟然破天荒地获得了作家本人赋予的特权——一张空白的书页,以邀请读者自己画出其心目中的美女。实际上,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第一幕第二场中也曾写道,“我不过在世间占了一个位置,也许死后可以让更好的人来补充”(Shakespeare 232)。显然,这种通过“不在场”或不确定性而引发的对能指的意向性召唤——霍根称之为“定向空白”(Hogan, *Beauty* 83)——正显现了“拟真”在审美反应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当然,这种与中国书画艺术中的“留白”技法不乏相似的美学现象(在霍根那里同样为野兽派创始人马蒂斯[Henri Matisse]所精于展现),不仅在其表征形式上回应着格式塔心理学中的闭合原则,而且在理据意义上证实了认知神经科学的结论,即人的右脑具有完形加工的独特“神经基质”(neural substrates),它不仅对模板加以“辨识”,同时也对尚未完整展示的模板结构加以“合拢”;与此相应,人的左脑表现出相似的、被称为“因果虚构”(causal confabulation)的神经基质,它负责以假想性的叙事模态弥合逻辑上存在的裂隙(Hogan, *Beauty* 89)。“空白美学”引发的神秘“他性”乃是一种围绕“主体性分享”所产生的徒劳欲望,一种唯有借助“稍纵即逝”的“微弱线索”方能间接触及的“不可理解性”(91)。这种因“留白”(white blankness)而产生的神秘主义在霍根看来,也正是穆斯林苏菲派与印度教吠檀多派获得其审美崇高的精髓(99)。

三、“变奏”“经典化”与“审美争议”

霍根提醒我们,人脑在审美反应中的“模版识别”现象背后隐藏着“实证性”的发生肌理。虽“不在本书探讨范畴之内”,但他仍打算顺带说明两个“双重问题”:一是“规则的提取如何成为可能,以及规则何时成为习惯”;二是“模版偏离现象何时算作变奏(variation),又在何时算作反常(anomaly)”。对于第一个问题,霍根的答案是

“艺术的重复”以及模版自身的笼统度或简易度(如英语诗歌中的抑扬格五音步);对于第二个问题,霍根似乎从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普遍语法参数”理论当中汲取灵感,提出了“带有变量的[基本]规则”(如《第五交响曲》开篇处基本恒定的起始音符与小节末尾可变的相对时值)以及“元规则”(meta-rules)/基本规则之间的动态转换(如《第五交响曲》开篇主旋律的改变)。基于此,先前讨论的“非惯常性模版识别”亦可通过此处的“规则、变量与元规则”加以厘清(Hogan, *Beauty* 147-51)。

围绕模版与变奏这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霍根不仅进一步将视线延伸至“公共美与审美反应”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而且还不乏创意地介入到文化工业批判和文学经典化现象之中。他从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Adorno)那里受到启发,认为“公共美”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规范在影响个体审美反应的同时,实际上也在塑造文化消费者的诸多“模版”;换言之,它不仅生产我们想看到的,同时也在生产我们看的方式(Hogan, *Beauty* 153)。实际上,这也同样回应着文学“经典化”进程中,“非经典”作品或经典作品中的“非经典特征”遭受的“审美贬抑”(aesthetic discounting)(157)。正是在这一立场上,霍根借助自己亲历的“《奥赛罗》难题”(“My Othello Problem”),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批评者的双重身份细致分析了“莎翁崇拜”(bardolatry)对其本人(作为审美主体)所施予的影响。霍根由此总结出文学“经典化”带来的四个潜在弊端:一是扭曲读者的审美判断;二是导致读者对作品中的“表层缺陷”视而不见,进而无法发掘作品“实至名归”的深层玄妙及其所包含的“得以增强的审美体验”;三是牺牲受众审美反应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四是阻碍受众对作品中的美学逻辑冲突(如奥赛罗在误杀妻子后流露出的世俗虚伪与那一场景本身理应表达的悲剧崇高)进行辨识或认可。有趣的是,围绕“经典化”所展开的审美反思实际上总离不开对“缺陷”“冲突”加以自然化的重访路径,如霍根所戏谑的那样,“或许,在进一步寻求合法性解释的同时,我不过是再一次沦为莎翁崇拜诱惑下的牺牲品”(175-77)。

围绕经典化的文学或艺术产品,审美反应的个体化特质尤其容易引发“审美争议”(aesthetic

argument),但是积极的审美争议则不止于提出某一对立的主张,而是促使我们对具体作品加以“重新思考”,借助理性和证据获得“阐释的精确性”(Hogan, *Beauty* 179-80)。审美争议的内容若关乎“品质”则能够增强审美愉悦,若关乎“问题”则会削弱审美愉悦;“品质”争议源于作品被低估(如作品中的瑕疵实际具有为受众所忽略的独特价值),而“问题”争议则源于作品被高估(如作品中的瑕疵因作品本身的经典地位而被人为忽略)(183,186)。审美争议中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争议主体的“审美敏感度”(aesthetic sensitivity)与“审美表达力”(aesthetic articulateness)存在不一致的可能。就某一作品的美学程式而言,一个业余的审美主体可能会体现出天然的敏锐意识,而一个专业审美主体却可能因其长期专业训练而出现“审美盲点”;不仅如此,即便后者能够围绕作品的美学程式进行成功“编码”,也可能会因为过于熟悉审美对象而造成“移情局限”(empathy limitation),从而无法深刻体会作品中的人性(189,193)。

四、商榷：文学认知研究路径上的三个问题

霍根的文学认知研究策略从他围绕《达洛维夫人》展开的阐释中可见一斑,不妨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种“回路”(circuit): 1. 逻辑回路,用以证明叙述话语的可靠性。譬如,彼得·沃尔什(Peter Walsh)将“纯粹、简单的美”与“走廊的对称”相关联,反映了人脑认知结构围绕对称“原型”/“模版”所产生的审美愉悦(Hogan, *Beauty* 35)。2. 神经回路: 赛普蒂默斯对榆树起伏运动的陶醉暗示了“基于多巴胺的奖赏机制”(dopamine-based reward system)的激活,它掌控“寻求愉悦之行为”(30, 112)。3. 聚焦回路,这一路径与图形-背景理论存在显著的学理关联,它分析的是“兴趣与关注导向”。例如主人公克拉丽莎(Clarissa)想起好友萨莉·塞顿(Sally Seton)之际,她将周边的环境仅仅视为“萨莉的背景”,这样的文本描述印证了人物在其认知进程中对前景聚焦对象的“关注导向”(36)。4. 情感回路: 克拉丽莎围绕萨莉所产生的“美妙时刻”,不仅源于后者的独特个性所引发的“非反常性意外”,更源于前者对后者所持有的“依附情感”(36)。

霍根将《达洛维夫人》视为其审美认知解读的范本,旨在说明故事世界中的人物情感如何在认知科学的理论框架中得到印证。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他的文学认知研究似乎更多地适用于阐释文本局部地带的审美发生逻辑,而对文本的话语体系缺乏完形观照,继而在批评实践中流于碎片化,某种程度上也忽略了作品的总体艺术性。这当然也是目前文学认知研究本身留给学术界的印象(Crane 77)。不仅如此,霍根的局部“认知”结论往往难免还要将我们带回传统的政治批评路径——“简言之,[达洛维夫人]之所以求助于举办派对”,乃是“因为女性能获取的社会机遇极为有限[……]毋庸说,这一复杂的女性主义观对我们理解该小说是重要的。不过,就我们的研究宗旨而言,其重要性则主要在于它暗示出人类创造并分享审美体验的广泛诉求”(Hogan, *Beauty* 44)。霍根在“文学美学”那一章节的末尾如是展现了传统文学批评与文学认知研究可能得出的不同结论,其初衷乃是为了说明后者的阐释创新,但却同时暴露了文学认知路径中因“视差”而产生的缺憾,也即当我们聚焦于艺术生产的“情感分享机制”时,却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与传统批评的内在价值纠缠不清。霍根所面临的尴尬,似乎只能在《法国中尉的女人》提供的后现代结局中找寻出路。

其次,霍根的文学认知研究时而基于这样一种默认,即在读者心目中,“故事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延续性”;换言之,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认知上的“被假定的同构性”(assumed isomorphism)”(Hogan, *Beauty* 203)。事实上,霍根本人在将认知科学理论嫁接到文学阐释过程中,也同样将这一“被假定”的“同构性”视为合法: 所有那些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认知规律,均可适用于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及其行为。应当说,认知科学围绕“情感”“记忆”和“审美”等诸多层面所做出的研究结论对文学认知探索产生了极具价值的影响和启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不少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故事世界内部的本体认知逻辑——美国学者宋惠慈(Wai Chee Dimock)将这种有别于现实世界中的“科学推理”和“法律推理”的独特模态称为“文学推理”(literary reasoning);所谓“文学推理”,乃是指一种基于可能世界语义逻辑之上的虚构思维图式,

尽管它在概念上多少流于矛盾修辞(古怪的人物行为或是超自然的奇诡事件似乎与现实意义上的“理性”背道而驰),但宋惠慈依然采用这一独特的表述以强调,“将文学视为认知现象恰恰悖论性地使得认知这一概念本身失去了稳定性”;换言之,可能世界逻辑意义上的“文学推理”相对于现实世界中代表工具理性的“科学逻辑”或“法律逻辑”来说,乃是“更为复杂”的认知现象(826—27)。因此,我们既需要一方面强调威尔逊(E. O. Wilson)所提出的以“跨学科合作”为特征的“融通贯一”(consilience),另一方面也要留意霍根教授本人所担忧的那种“将文学认知研究当作新奇手段的危险”(Jaen and Simon 3-4)。

长期以来,跨学科文艺批评的一个常规路径表现为,某一科学理论术语体系不仅能够用来解释现实世界,并且也可以毫无差别地延伸到文艺作品的虚构世界中。这一传统自弗洛伊德心理学诞生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尤为突出。实际上,霍根早在《心智及其故事:叙事共性与人类情感》一书中已经留意到(尽管只是开篇处的“免责声明”)真实情感与虚构情感之间的本质差异——“围绕情感而展开的描写”以及“围绕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情感反应”(Hogan, *The Mind* 1-2)。在《认知科学、文学及艺术》当中,霍根同样注意到移情现象与虚构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围绕“虚构性问题”(fictionality problem)所给予的回答却显得有几分草率:

这也很好解释。我们的情感反应实质上乃是关乎直觉触发、具体想象和情感记忆。虚构性问题根本就不会介入。知道某物是虚构之物意味着做出某物并不存在之判断。但是存在性判断基于大脑皮层。它们与我们对事物的情感反应关系相对较少。情感反应的强度受到许多变量的影响,如我们先前所强调。(Hogan, *Cognitive* 185-86)

且不论上述“解释”中的概念移置(“情感反应”与“情感反应的强度”并不对等);单就“虚构性问题根本不会介入”而言,霍根教授的最终落脚点并没有停留在上述认知现象本身,而是以一种“元理论”式的回旋,从进化心理学当中寻求援

助——“我们的祖先未曾遇到那种必须在真狮子与假狮子之间做出甄别的情境。存在性判断对他们的生存没有特别的价值”(Hogan, *Cognitive* 185-86)。显然,这一化约式的结论没有充分考虑到“我们的祖先”具有艺术审美的基本需求(譬如远古时代留存至今的原始岩画)。“虚构性问题”同样出现在霍根的《作家的心智如何创造故事》一书中。作为一种将文学发生学、认知科学与叙事学融为一体的批评尝试,该书特别强调文学创作过程中“拟真”与“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之间的关联;但他的“拟真说”同样忽略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想象哈姆雷特遇见奥菲莉娅会怎么做”尽管与“想象老板听员工说要加工资会怎么办”存在“直接的可比性”,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两者存在着本质差异:前者发生在真实世界与可能世界之间,而后者则完全发生在真实世界中;当霍根接着指出“我们对于反事实拟真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学生产的理解”(Hogan, *How Author's Minds* xiii)之际,他也大概未曾意识到“文学生产”本身业已作为“反事实拟真”而存在,并因此而多少陷入逻辑上的循环论证。有意思的是,C. S. 路易斯(C. S. Lewis)在论及文学“现实性”之际曾列举过几个有趣的例子,“孩子们不会被神话故事欺骗,他们经常严肃地被校园故事欺骗;成人不会被科幻小说欺骗,他们却会被女性杂志中的故事所骗”(路易斯 85)。这恰恰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文学认知研究有必要考察“拟真”在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展开运作时所依赖的独特认知机制,而不是进行简单类比,至少我们应该考察认知强度在那一进程中的微妙差异如何有可能引发文艺美学逻辑的突现。或许,我们应该记住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围绕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逻辑论所坚持的调侃姿态,“一棵树既为树又非树”,当然不是以“是否能付诸现实构想”来作为“公理标准”的,但却可能是“天使或魔鬼以及许多凡界的疯子或超验主义者所热衷玩味的”(14)。

第三,在霍根的文艺认知美学建构中,神经科学的理论术语和实证方法虽有所呈现,但略显机械感。一个有趣的事例在于,当霍根试图说明人脑在审美反应中所展开的选择性“编码”进程时(比如在关注前景目标之际忽略了背景模式),他

引用了视觉神经机制中的“侧抑制”(lateral inhibition)现象作为佐证,指出自己的学生如何在欣赏印度“兴都斯坦鼓乐”时仅仅识别出节奏的脉动,却未能提取节奏的循环模式(Hogan, *Beauty* 55)。这一解读看似非常合理,而实际上却是通过一个隐喻性的阐释结构进行了概念替换;因为霍根此处的判断是听觉认知对音乐审美的影响,而“侧抑制”乃属于视觉认知现象,两者之间无法简单在科学层面上直接画上等号。毋庸说,这种“隐喻式认知阐释”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于当下的文学认知研究路径当中,尤其体现于“文学达尔文主义”利用乔姆斯基的普遍语理论所建构出的所谓“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Kramnick 334-36)。

笔者认为,认知神经科学倘要成为文学认知研究的有效结构性话语,就必须至少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认知神经基质如何系统地服务于文学叙事的整体话语逻辑?二、艺术表征与神经机能之间的隐喻/类比关联是否需要(以及如何)经受认知神经科学的验证?霍根在捍卫情感认知研究中的文学本体身份时,指出那一研究“并不需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而神经科学家们也“未必需要文学”(What Literature Teaches 23),何况那种基于实验室运作的“硬科学”还可能因其固有的“简单化与人工化”而对情感认知研究造成不良影响(38)。有意思的是,霍根却在随后的情感研究进程中不得不“将此工作融合到神经认知框架中”(40)。实际上,与音乐、绘画、舞蹈等其他文艺形式的跨学科认知研究相比,文学尚未真正进入认知神经科学的实证阶段(胡俊 169),而与此同时,文学研究队伍中也的确存在相当数量的从业人员在其批评实践中依然因循“认知诗学”早在20多年前设定的经典模式——“用认知科学提供的工具去从事文学研究”(Tsur 1),而没有充分体现文学研究自身对于认知科学发展所起到的愈发重要的作用。幸运的是,当下西方认知神经科学家们已经对世界文学中的“病理症候”(譬如“双重人格现象”[doubling])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实证研究,使得国际文学认知领域业已取得的丰硕成果有了可为借鉴的参照系:2006年9月21日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上刊载认知神经科学家沙哈·阿尔希(Shahar Arzy)等人的实验报告——《幻象影子

人物的诱发》(“Induction of an Illusory Shadow Person”);2010年,瑞士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的卢卡斯·海德里希(Lukas Heydrich)等人在《意识与认知》(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杂志上发表《幻象中的自我身体感知》(“Illusory Own Body Perceptions”)一文。^②上述研究案例为文学认知的探索提供了另一种颇具可行性的实证路径;当然,文学认知研究也亟需树立虚构世界内部的本体逻辑,与认知科学领域的文学介入模式保持距离,在艺术性、拟真性与实证性之间找准契合点,真正实现文学研究与认知科学互通有无、平等对话的愿景。

注释[Notes]

- ① Patrick Colm Hogan. *Beauty and Sublimity: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6.
- ② 关于国际上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围绕文学中的双重人格现象所展开的研究概况,详见于雷:“西方文论关键词:替身”,《外国文学》5(2013): 100—12。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Crane, Mary Thomas. “Surface, Depth, and the Spatial Imaginary: A Cognitive Reading o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Representations* 108.1(2009): 76-97.
- Dimock, Wai Chee. “Cognition as a Category of Literary Analysis.” *American Literature* 67.4(1995): 825-31.
- Hogan, Patrick Colm. *Cognitive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 *The Mind and Its Stories: Narrative Universals and Human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 . *What Literature Teaches Us About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1.
- . *How Author's Minds Make St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3.
- . *Beauty and Sublimity: A Cognitive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6.
- 胡俊:“艺术·人脑·审美——当代西方神经美学的研究进展、意义和愿景”,《文艺理论研究》4(2015): 164—72。
- [Hu, Jun. “Art, Brain and Aesthetics: On the Development, Significance and Vis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Neuroaesthe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2015): 164-172.]
- Ingarden, Roman.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 Trans. Ruth Ann Crowley and Kenneth R. Ol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P. 1973.
- Jaen, Isabel, and Julien Jacques Simon, eds.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Current Themes and New Direction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2.
- Kramnick, Jonathan. "Against Literary Darwinism." *Critical Inquiry* 37.2(2011): 315-47.
- C. S. 路易斯:《文艺评论的实验》,徐文晓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Lewis, C. S.. *An Experiment in Criticism*. Trans. Xu Wenxiao.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07.]
- Poe, Edgar Allan. Eureka. Eds. Stuart Levine and Susan F. Levin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 Shakespeare, William.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New York: Gramercy Books, 1975.
- Tsur,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2.
- (责任编辑:王嘉军)

